



蔡昉：以更公平的收入分配 体系推动中国经济增长



文/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蔡昉

➤ 中国人口转型趋势不可逆转，目前人口数量已经接近峰值，中国已步入“老龄社会”。这将极大地削弱消费能力，制约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实现。为解决上述问题，必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，构建中国特色的福利制度体系。

➤ 在“瓦格纳加速期”，中国经济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、消费需求疲软两方面的挑战。因此，必须在城市化过程中更加关注缩小“差距”，包括中国与先进经济体城市化水平的差距，以及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的差距，倡导以人文本的城市化改革。

➤ 目前看来，中国的不平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城乡差距，包括就业和获取公共服务的机会差距。因此，最紧迫的改革就是破除户籍障碍、倡导劳动力的自由迁移。

——蔡昉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（CF40）学术顾问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

*本文为作者在 CF40-PIIE 中美青年圆桌第 6 期“如何分蛋糕：贫富差距和政策选择”上所做的主题演讲。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。

”

以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

推动中国经济增长



中国人口趋势不可逆转

改革必须更加强调收入分配

研究中国的不平等现象，国外学者和企业家会十分关心两个问题。一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政策取向对中国来说是否恰当？二是未来 15 年中国经济如何才能实现合理的增长速度？我先尝试回答这两个问题，然后对几个具体问题做出回应。

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以来，中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，每个阶段的收入分配都有其特征。

第一阶段，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制度遗产是普遍贫穷。1978 年，农村

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 2.5 亿。当时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是年收入 100 元，这类人口已经处于极端贫困状态。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之一，在于奉行平均主义，缺乏激励措施，由此引发“铁饭碗”的问题。这一阶段增加激励措施，必然会拉大收入差距。但在这一阶段，收入差距并不是最受关注的问题，提高劳动者积极性和人民生活水平才是最迫切的任务。

第二阶段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，并体现二元经济发展特征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，劳动力无限供应，靠人口红利推动了经济增长。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具有包容性特征，尽管基尼系数提高，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扩大，但每个群体的收入都在增加。就业的扩大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，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量。

第三阶段，中国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放缓，城市化速度减慢，经济增长速度随之减慢。这一时期，仅依靠劳动力市场或初次分配已经无法实现收入公平的目标。为解决新时期面临的新问题，必须部署更多种类的政策工具，加大再分配力度。

当前中国面临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，一是就实现“十四五”和“2035 年”目标而言，逐年放缓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是否可接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根据 10 年前的估算结果，中国 GDP 的潜在增长率会不断放缓。而这十年的实践结果也证明，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确实在放缓，并且放缓的速度与 GDP 的潜在增长率一致。只要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和潜在增速保持一致，并且潜在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，就可以实现上述规划目标。未来，

中国经济增速终究要回归世界平均水平，但这种情况要到 2050 年才会出现。

二是需求侧能否继续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支撑？这取决于一系列因素。需求结构方面，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因素即净出口、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，支撑了经济增长。但是以后呢？我们从最新变化来看。第一，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，2020 年全国总生育率只有 1.3，说明中国的人口变化是不可逆的；第二，2021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 0.34‰，可以说人口数量已经接近峰值；第三，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 14.2%。根据定义，如果一国的老年人口比例超过 7%，即可被称为“老龄化社会”；如果老年人口比例超过 14%，即可被称为“老龄社会”。由此可见，中国已经正式迈入“老龄社会”。

上述三个人口因素的变化会削弱需求，特别是消费。第一，人口总量效应。如果人口增长率为正，消费增长率也会为正。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，如果人口增长率为负，消费增长也会遇到困难。第二，年龄结构效应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中国的情况与发达国家不同。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比较低，消费水平也不高。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削弱消费。第三，收入分配效应。一方面，富裕人群收入增加，他们的消费水平不会有很大提升；另一方面，穷困人群收入不足，他们的消费需求会受到收入的限制。

由此可见，中国的人口转型趋势已经不可逆转，改善收入分配是应对

消费收缩挑战的可行路径。20 世纪 30 年代，贡纳尔·米尔达尔（Gunnar Myrdal）、梅纳德·凯恩斯（Maynard Keynes）和艾尔文·汉森（Alvin Hansen）都曾对人口、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发表过重要著述，并得出了同样的政策建议：人口停滞呼唤新政策的出台，而这个新政策高度强调收入再分配问题。事实上，从那时以后瑞典、美国和英国都建立了福利国家。

中国即将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

需求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制约

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，中国预计在 2025 年之前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，并在 2035 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。目前可以说，中国已经跨越了所谓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然而，新的挑战仍然严峻，需求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将变得非常关键。

2021 年，中国人均 GDP 超过 12551 美元，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。然而，即使统计上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，中国经济也将面临很多挑战。这些挑战中最重要的是如何突破消费制约，根本途径是增加居民收入、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。

以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·瓦格纳（Adolph Wagner）命名的“瓦格纳法则”发现，随着居民人均收入增加，为满足人们对公共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，政府开支、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将不断增加。这个法则曾得到许多

经济学家的验证。我们从跨国数据可以观察到，在人均 GDP 从 10000 美元增长到 23000 美元的阶段，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上升最为迅速。所以这一时期可以被称为“瓦格纳加速期”。

根据经济发展目标，即从目前人均 GDP 超过 10000 美元提高到 23000 美元，中国已经进入“瓦格纳加速期”，并将持续到 2035 年。在中国 GDP 总量、人均 GDP 今后呈现增速减缓态势的同时，中国将面临基础公共服务不足、收入分配不均的挑战。在此背景下，构建中国特色的福利制度体系，是当前迫切且不可避免的任务。

构建中国特色的福利制度体系，关键在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。这两个领域的诸多改革都可以为中国带来红利，同时解决收入分配问题，例如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改革。当前中国面临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挑战。供给侧的限制主要是劳动力短缺。许多人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劳动力今后是负增长。需求侧的限制主要是认为消费将持续不振。这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缩小与更高收入国家在城市化水平上的差距，甚至消除这个差距得到解决。

这里所说的差距包括两方面内容：一是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上的差距，二是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之间的差距。后一差距意味着进城农民工尚未获得城市户口，当前这一差距高达 18 个百分点。消除上述差距，中国可获得可观的劳动力供给，并通过将其配置到非农业部门，从而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。另一方面，通过将 2.6 亿农民工转化为拥

有本地户口的城市居民，大幅度扩大消费。根据 OECD 的估算，这将使农民工消费提高 30%，是一个巨大的改革红利。

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0 年达到顶峰，此后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。劳动力短缺不仅体现在数量方面，也体现在人力资本方面。随着新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速度减慢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也放缓。另一方面，资本劳动比增加，导致投资回报率也在不断下降。这会带来两个影响，一是经济潜在增长率不断下降；二是中国失去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，从而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后，出口增速也开始放缓，就是因为正在失去竞争优势和人口红利优势。

与此同时，中国还存在着数量巨大的中等收入人群，大规模脱贫人口的数量也非常庞大。提升这部分群体的消费能力，将创造出巨大的消费需求，这也是中国提出“双循环”战略的原因所在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中国并非在切断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，只是挖掘自身的内需潜力。虽然当前阶段，中国正在失去以往的比较优势，但未来仍将获得新的、动态竞争优势。在此之前，中国可能会更加关注国内市场。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0325

